

第一讲 文化的定义、 特征和功能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塑造了人。每代人的民族文化心理，都是由特定时代的文化背景塑造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特定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民族文化背景创造和发展出来的。它体现与陶冶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人共通的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等内容。

文化犹如空气，我们身在其中，深受其熏染，也参与着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此时此刻的我们正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塑，但我们并未对此有清晰的感知。文化是神秘的，中国传统文化更是博大精深，如何才能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影响机制呢？这就需要我们首先理解文化的概念与功能。

第一节 文化的定义

我们现在所表述的“文化”这个概念，在西方源于拉丁文“cultura”，后来演化在德文中写成“kulture”，在英文与法文中写为“culture”。其拉丁文的原意是耕种（动词），后来逐渐引申为对树木禾苗的栽培，再后来又引申为对人类心灵、知识与情操的化育。可见，西方早期的文化观是从物质生产逐渐引申到精神生产的。直到今天，“culture”也和物质生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比如英文“agriculture”意思是农业，“culture pearls”表示人工培育的珍珠。可见，西方文化观中“culture”自诞生起，就既有物质生产又有精神生产的含义。

伴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开始拓展他们的生产生活空间。他们所到之处，都遇到了不同于欧洲的“土著人”（当时，欧洲侵略者还给他们冠以更难听的词语“野蛮人”）。此时，欧洲人发现了“土著人”共同存在但不同于欧洲人的某些特征，而且欧洲人常常把他们感受到的这些差异性特征与该民族联系起来。总之，这些非欧洲民族部落突出的行为、情感和思想等内容，后来渐渐被称为“文化”一词。

文化人类学之父泰勒（E. B. Tylor）是第一个使用现代意义上“文化”一词的人。他在人类文化研究开山之作《原始文化》（1817年）一书中，将文

化定义为：“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① 这一概念一直影响着后世关于“文化”的研究。

理解泰勒的这个文化定义，需要从两方面出发：一个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另一个是“复杂的整体”。在寻求对复杂整体的经验理解时，有人提出了文化是人类全部的生活方式，在寻求对“社会成员的人”的整体经验理解时，提出了文化是一种超有机体。^② 此时的文化观，主要是分析“异族”的有关特征，具有较强的西方种族主义观念。

随着西方社会的进步，人们逐渐认识到种族主义的学术缺陷，认识到文化是每个民族及其成员的“或多或少的一点财产”时，才出现了新的文化观：文化即“意义”^③，文化是“一个社会中所有象征符号的总体”^④；每个象征符号都是一个客体，均表示着某种社会意义。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也认为：“事实上，文化就是赋予生命以意义的事物。”^⑤ 卡西尔（Ernst Cassirer）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文化是符号的形式。在其文化哲学观点看来，人类文化活动是一种“符号”或“象征”性活动，在活动中建立起人的文化主体性，并整体构成一个文化系统。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和历史等文化活动都是符号活动，并以此塑造了“文化人”。

在中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后引申为文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文”通“纹”，花纹、描绘之意。后来逐渐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到了先秦时代，“文”已经被广泛用于各种典籍了。《尚书·序》中有言：“由是文籍生焉。”^⑥ 此处“文”指的是文字。《尚书·大禹谟》：“文命敷于四海。”^⑦ 此处称颂大禹以文德化育四海，这里的

① [英] 泰勒：《原始文化》，蔡江浓编译，1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② 张祥平：《人的文化指令》，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③ [美] 马尔塞拉（Marsella, A. J.）等主编：《跨文化心理学》，肖振远等译，54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④ 张祥平：《人的文化指令》，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⑤ [英]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9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⑥ （汉）孔安国注、（唐）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⑦ 同上书，122页。

“文”是文德教化之意。《论语·学而》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①此处的“文”与“德行”对应，指的是“六艺之文”。如果自然性与社会性有机结合在一起，就是君子之风范了。显然，这里的“文”就是人的社会性这一意思了。

“化”本义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如《礼记·乐记》：“和，故百物皆化。”^②这里“化”指的是“化生”“转化”之意。又如，《素问》：“化不可代，时不可违。”这里“化”指的是“造化”之意。

将“文”与“化”一起使用，最早出现在《易》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上，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③（《贲卦·彖传》）这里的“天文”即自然之道外显的自然现象，“人文”即是人的社会行为和社会机制及其创造成果，泛指社会中的各种关系；“人文化成天下”，也就是通过社会教育让人们自觉形成良好、和谐的社会关系网络。这奠定了中国早期的文化观：文化，即“以文教化”之意，通过诗书礼乐、道德伦理等教化百姓。

中国古代的文化观中，文化往往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它本身包含着一种正面的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治国理政中“阴”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意义。同时，中国古代很大程度上是将“文化”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和主张，它既与武力征服相对立，又与之相联系，相辅相成，所谓“先礼后兵”、文治武功。

通过前面西方关于“文化”定义的梳理，我们知道，“文化”的定义受到较强的时空背景影响，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 1952 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 160 多种，而当代有学者统计，“文化”这个概念的定义至少有 200 种以上了。文化这个概念可大可小、众口不一，在不同的领域与场合都有不同的意义。有的理解把文化等同于知识或学历，比如一个老农指着

① 何晏注，邢昺疏，朱汉民整理，张岂之审定：《论语注疏》，7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②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全三册），1477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③ （魏）王弼注，（唐）孔颖达正义，李申、卢光明整理，吕绍刚审定：《周易正义》，105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一个大学生说：“你看，人家有文化。”有的理解几乎等同于文学和艺术，把时尚、餐饮、运动、广告、杂志和日常生活等忽略不计，导致发展文化事业时过于单一。有的“将文化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对外部物质条件的反映和对阶级利益的表达”。^① 这种观点似乎有不少道理，但也可能会引起较大的思想矛盾和文化斗争，更不可能在这样的观念下搞一个全社会各阶层认同的文化产业。

后来，文化研究者更倾向于把文化理解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和“一种普通的生活方式”。^② “所谓一种文化，它指的是某个人类群体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整套生存式样。”^③ 但是，这样的文化定义，又常常让人把“文化”“文明”混淆。钱穆说：“其实 Civilization 和 Culture 这两个字，都是很近代才有的，所以可说是他们西方人很近代才有的观念。但我们拿中国古代早就原有的文化、文明二词来翻译，却是很有意义的。”钱穆先生认为，文化即“生活”，文化是群体性、综合性、可持续的生活整体。^④ 在当代中国发展了这一看法的是当代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他认为：“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⑤

尽管中西方古今学者对于“文化”概念的理解千差万别，但“文化”的概念也有一些比较稳定的内涵和特征，比如讲，都是人类创造的、人为的东西，是可以传承的，对于人类生活和社会都有重要意义，等等。基于上面的清理，本教材对文化作一个较为宽泛的界定：

文化是人类特定群体创造的、可以递相传承的、使人类特定群体以超自然方式生活的全部成果之总和。

① [英] 阿兰·斯威伍德：《文化理论与现代性问题》，黄世权、桂琳译，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② 同上书，3页。

③ [美] 克莱德·克鲁克洪等：《文化与个人》，高佳、何红、何维凌译，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④ 钱穆：《文化学大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⑤ 余秋雨：《何谓文化》，6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第二节 文化的特征与功能

一、文化的特征

上面对文化的这一定义，内含了文化的五大特征。

1. 人为性

文化不是自然生成的，是人类的创造物，是人为的。人与动物不同，支配动物行为的本能，是动物物种的自然特性；人的行为则是靠人后天习得的文化来支配。支配人的行为的，表面上看是外在于人的事物及其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它们必须转化为知识、价值、意义才能内在地控制人的行为。前人、他人的生存活动对自己的影响也是如此。

2. 可交流性

不同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人文传统等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渊源，并发展出了千差万别的文化样式。通过文化适应，文化成员接受与习得了相同的文化内容，文化得以积累和传承。所以，文化不是那种即生即灭、转瞬即逝的东西。正是在文化这种相对稳定的传承基础上，形成了特定群体的文化传统，并由此形成了特定群体特定的文化模式。

有学者认为：“文化是让个人的行为为社会的其他成员所理解的公约数。”^①文化的可交流性，指文化可以在同一文化背景 and 不同文化背景、同一时空和不同时空的人类成员之间通过特定文化行为与符号互相传递信息的特征。人类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进行超自然的沟通交流和分享信息，正依赖于文化可交流性这种特征。

3. 可传承性

文化是可以积累和传承的，不是那种即生即灭、转瞬即逝的东西；在文化可传承性的基础上，形成了特定群体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指的是在一种文化

^① 拉里·A. 萨默瓦、理查德·E. 波特、埃德温·R. 麦克丹尼尔：《跨文化传播（第六版）》，1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中代相继承、传递的知识、规则、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这些是一代代文化传承的结果。文化传承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的，特定社会与文化环境的无意识熏陶浸染、特定生活方式的无意识模仿和接受、特定文化机构和组织如学校的有意识灌输和引导等，都是实现文化传承的途径。

我们发现，文化的可传承性和可变异性是统一的。文化的可传承性建立在文化的稳定性基础之上，但文化的稳定性是相对的，文化也在不断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息的“创新过程”。文化创新来自各种因素，“在诸如人口增加、技术革新、环境危机、外敌入侵以及文化内行为和价值观发生改变等情况下，人们要对其做出反应，变化因此产生”。^①

一般情况下，文化易变的部分是初级行为，服饰、事物、居住方式、交通方式等容易随着流行而变化，但核心价值观、思维方式、宗教体验等内容却是很难被迅速和轻易改变的。打个比方，文化犹如冰山一样，易变的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文化的内在部分却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4. 规范性与约束性

任何文化都意味着一套规范系统，它要告诉接受和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应该怎样生活和行动，而不能怎样生活和行动。这就是规范。这些规范既有以硬性方式存在的，如各种社会制度，也有以软性方式存在的，如各种社会习俗。既有作用于人外在行为的，也有作用于人内在思想感情的。所以接受一种文化系统，也就接受了这种文化系统的规范。这也意味着，文化是有约束性的。

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认为，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给人们的各种行为以意义，并将各种行为统合于文化整体之中的法则。在她看来，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是因为各种文化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即民族集体人格，人们的行为受这些文化的制约。

文化适应（enculturation）指的是文化成员学习某种文化的整个过程。在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中，与“文化适应”相近的词是“社会化”。不论是使用哪个词，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文化个体从婴儿期开始，就不断学习所处文化的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直到完全领会并习以为常。

^① 拉里·A. 萨默瓦、理查德·E. 波特、埃德温·R. 麦克丹尼尔：《跨文化传播（第六版）》，2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5. 系统性

文化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观念等构成的系统，是这些成果的总和，而不仅仅是指其中的某些部分。文化大体可以分为器物层、制度层、精神观念层（内在文化心理与外在符号形态）三个层面。人类的生活世界贯穿于这三个层面和领域，因此，这三个层面都统一在人类的生活世界、生活方式中。文化是人类特定时代特定群体创造的、可以递相传承的生活方式及其精神价值生态共同体。这个“生态共同体”中包含着多元层级文化的生态系统。

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形态，包括生产工具、劳动对象以及创造物质产品的技术等内容。物质文化来源于技术，并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直接相关。物质文化不是所有物质形态的单纯存在或组合，自然状态下存在的物质，不属于物质文化的范畴。物质文化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技术和物质产品的显示、存在和组合，不同物质文化状况反映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物质文化不单指“物质”，更重要的是强调一种文化或文明状态。

制度文化是人类为了自身生存、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主动创制出来的有组织的规范体系，主要包括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人才培养选拔制度、法律制度和民间的礼仪俗规等内容，是文化层次理论要素之一。制度文化是人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准则等，都是制度文化的反映。

精神文化是人类在从事物质文化基础生产上产生的一种人类所特有的意识形态，它是人类各种意识观念形态的集合。精神文化的优越性在于，一是具备人类文化基因的继承性，还有在实践当中可以不断丰富完善的待完成性。这也是人类文化精神不断推进物质文化的内在动力。由于文化精神是物质文明的理念意识体现，在不同的领域，其具体文化精神有不同的表现和含义。

二、文化的功能

“功能”（function）在汉语文献史籍中很早就已经出现，大致有以下两种含义：一是效能；二是功绩、才能。现代管理学意义上的“功能”是指一个事物对于对象所具有的某种作用和意义，它能够满足对象某种需求的属性。文化的功能指文化对人类的基本作用 and 意义。

本讲将文化的功能归纳为阐释功能、评价功能、实践功能三大基本方面，

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1. 文化的阐释功能

文化是不同人类社会共同体对世界、人类群体和个体本性、命运、历史、现实和未来的阐释系统，这个阐释系统的结果就是知识系统的建构：关于自然、人类（个人与群体）世界、历史知识的生成、积累与传承的观念系统。人类的知识系统，就是人类对自然、人类群体和个体历史与现状的阐释结果。因为文化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是由不同人类群体创造的，而人类不同群体文化的知识系统是有差异的，所以也有同一的或相同相融的构成。

文化的阐释功能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人类的对象世界即自然的阐释；二是对人类自身的阐释；三是对人类生活世界和人类历史的阐释。前者形成了人类有关自然科学的知识系统，后者形成了人类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系统。文化的阐释功能就是要回答：世界、人、人类历史和现实是怎样的？这个阐释的结果，就是一套知识系统的形成，即所谓真理系统。文化阐释的权威性，首先体现在它提供的这套知识系统被确认为是真理性知识。

2. 文化的评价功能

文化要提供一个关于人类个体与群体生活的价值、意义的评价系统，这就是价值系统的建构。价值系统是一种文化关于自然、人类世界（个人与群体）生活和行为价值准则的生成、积累与传承的意义系统。人类不同群体文化的价值系统是有差异的，也有同一的或相同相融的部分。

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是价值体系，这套价值体系覆盖了人类生活的五个基本方面，即人与自然、人类群体与群体、人类个体与群体、人类自我与他人、人类自我与自我。每一种文化的价值体系，都是围绕这五组基本关系展开和设计的，都要对这五种关系提供基本的评价标准。在这些评价标准中，文化的评价功能常常体现在一个核心问题上：在特定社会共同体和文化圈中，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不美的。

3. 文化的实践功能

文化一方面是人类在各种实践活动中产生、提炼和积累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必然会对人类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提供设计、框限和引导，这就是文化的实践功能。文化最核心的功能是实践功能，文化的阐释功能和评价功能，归根结底，都指向实践功能，最终要落实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为这种实践服务。

文化要对人类群体与个体的社会和生活实践的模式、途径、方式和方法进行设计、规范与引导，它也总要体现在特定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生活方式的形成、认定和改变中。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

“中国传统文化”，其中“中国”这一限定词，主要是以现代中国的民族构成和地理范围来确定的，指的是以汉族为主体、融合了其他 55 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共同体。而汉族的主要来源是古代华夏民族，因此本课程讲授的中国传统文化指的是以古代华夏民族文化为主体、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复合性系统。这决定了中国文化既有主体性指向，又有多元性构成。在这个前提下，本节我们着重介绍三个概念：“中国”概念的界定、中国人的由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界限。

一、“中国”概念的界定

本书“中国”的空间范围，指当代中国地理版图的范围。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对这个概念的来源和内涵变化作一个简单介绍。

“中国”这个概念在中国历史上最迟应该出现在西周初年的何尊铭文。何尊 1963 年出土于陕西鸡贾村，是周初一宗室成员名“何”的人为纪念周成王赏赐而铸造的。尊上铭文 100 多字：

唯王初壅，宅于成周。复稟（逢）王礼福，自（躬亲）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速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助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唯王五祀。^①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四卷，275 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

铭文大意是，成王五年四月，周成王开始成周营建都城，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周成王于丙戌日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内容讲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随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周王赏赐何贝 30 朋，何因此作尊，以作纪念。

著名历史学家葛兆光说：“‘宅兹中国’的‘中国’，可能指的是常被称为‘天之中’的洛阳。”^① 这个理解应该是合适的。何尊中的“中国”，即指周武王考察后计划新建的、周成王完成建造的都城洛邑，即成周。“宅兹中国”，即以中国（洛邑）为周王居所。所以，“中国”这个概念，最早指的是周人的首都。之后，其所指范围慢慢扩大到周人起源和统治的黄河流域中下游陕晋冀豫鲁等中原各诸侯国，即周人所称的“华夏”诸国地域。周人以当时的中国（华夏）为中心，将四方其他民族和国家分别称之为戎、狄、蛮、夷。这些民族和诸侯国并非都不属于周的属国，如被称为南蛮的长江流域楚国，统治者季连族团就是周初从北方受封到南方的，毫无疑问是周的属国，但在当时不算华夏即中国的范围。《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前 547）有“楚失华夏”一句，这是“华夏”一词首见典籍记载。（唐孔颖达疏：“华夏为中国也。”）其具体所指也为黄河流域为中心的诸侯国家。以华夏为中国，应该是早在当时人们心中的观念。而华夏族也就是后世汉族的主体，春秋战国之前，主要居住在黄河流域中下游。所以，当时这个地域范围称为中国。随着历史的发展，汉族与周边民族不断融合，疆域不断扩大，凡汉族居住的地域也都称为中国，这样，整个黄河和长江流域都被列入中国范围。但中国的概念并不总是以汉族为标准划界的，由于“中国”这个概念内含有中心之国的正统意思，所以，古代也被不同民族所使用。例如，南北朝时期，南朝、北朝都自称中国，而将对方称之为“索虏”或“岛夷”。《北史·序传》载：“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② 这种情形两宋时代也出现过。北宋、南宋都自称中国，但它们的敌国金、辽也自称“中国”。上述情况下，它们所用的都是“中国”概念中具有正统意味的“中心之国”的内涵。

战国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古代“中国”的概念，其所指范围也慢慢和

^①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自序，3 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② （唐）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3343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中华”“九州”“神州”“四海”等概念相近，其覆盖区域越来越大。但直到清代，都没有任何朝代将中国作为国家概念命称。“中国”作为国家概念命称是由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开始的，中华民国又简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简称“中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意义上的“中国”，其所指地理范围大体相同，略有差异。本书“中国”概念覆盖的地域，指的是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以及居住其上的所有民族和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同时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占中国总人口超过90%，所以，中国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

二、中国人的由来

中国漫长的古代文化是由居住在东亚大陆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人创造的，所以对中国文化进行考察，有必要对上古中国人的主体华夏民族（汉族的前身）的来源做一个概要梳理。

关于远古中国人的来源，从总体上看，存在本土起源论和外来迁入论两种观点，前者是传统和权威的观点，后者是近百年尤其是最近30多年来出现的极有挑战性的观点。

在春秋战国时代以来的中国古代文献中，代表着华夏人远古祖先的想象君王三皇五帝，甚至更早的神农氏、有巢氏、燧人氏等，都是起源于、也生活于中国本土的。所以在那个时候的历史文献中，中国人远祖的本土起源根本不是一个问題，一直到当代中国史学界很多史学家那里，这都是权威的观点。中国人远祖来源成为一个问題是从近代开始的。在19世纪，随着掩埋几千年的苏美尔-巴比伦文化遗址的发掘，大量文物、文献出现并被破译，西方人发现了一个起源于史前近四千年、人类最早进入阶级社会、有文字记载的文明。这个已经消失了几千年的苏美尔-巴比伦文明对周边的埃及、印度、希伯来、波斯和希腊古代文明都有深刻影响，于是，就有学者认定，全人类几大古老的文明都来源于苏美尔-巴比伦，这就是流行一时且影响深远的“泛巴比伦主义”。中国古代文明的来源问題在这种背景之下也被一些学者描述为来自古代巴比伦。其中最早和最有影响的中华文明外来说是法国学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 1844—1894）在《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一书中提出。在该书中，他描述道：“公元前2282

年，两河流域的国王 Nakhunte 率领巴克族（Bak tribes）从迦勒底亚出发，翻越昆仑山，历经艰险，来到了中国西北部的黄河上游。此后，巴克族四处征伐、传播文明，最终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他说，Nakhunte 又作 NaiHwang-ti，即黄帝之谓，巴克族则为“百姓（Bak Sing）”转音。他还列举了中国古代文化与巴比伦文化中近百种类似之处，证明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①

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论经日本学者转介后传入中国，得到当时许多中国著名学者和政治家如章太炎、刘师培、宋教仁等出于政治和学术多方面考量的认同，他们纷纷在自己的著述中表述这个观点，有的学者还将其编入历史教材。著名学者梁启超在 1901 年的《中国史叙论》中也曾接受“中国人种西来说”的观点。

但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中国本土具有现代意义的考古活动开始出现，考古学家在中国黄河、长江、辽河-大凌河等流域，发现大量距今 4 000 ~ 8 000 年间的文化遗址和文物，并发现更加遥远年代已经有人类生息于东亚大陆，例如，距今约 170 万年的云南元谋人、距今约 110 万年的陕西蓝田人、距今约 50 万年的北京人、距今约 2 万年的山顶洞人等，这些都可能是现代中国人的原始祖先。这使得拉克伯里的观点受到挑战，曾经认同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中国学者大部分放弃了这个观点。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中国人种和文化本土起源论遂成为中国学术界权威的结论。

然而中国人种和文化本土起源论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又面临着分子人类学的新挑战。在国际学术界，人类学家以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等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建立了分子人类学。他们和全世界范围内的遗传学家、分子生物学家联合，对现今居住在世界各地的人类基因进行大规模采样和测序，编制出现今居住各大洲所有人类人种的基因图谱，并根据基因裂变的规则，分别从女性染色体和男性染色体遗传变异规律角度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现今居住在五大洲的所有人类，都有共同的祖先，这个共祖从女性染色体角度推测，应该是大约距今 20 万年前后的一个非洲母亲，人类学家将之称为“线粒体夏娃”；从男性染色体角度推测，应是源于距今 15 万年前后非洲的一个共同父亲，人类学家将之称为“染色体亚当”。大约 10 万年前后，他们几个儿子的后裔们从非洲

^① 转引自孙江：《拉克伯里的“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载《历史研究》，2010（1）。

出发开始了向世界各地的迁徙。在迁徙的过程中，他们战胜并消灭了原来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其他人种，最后成为地球上现今的人类。在这个成果的基础上，中国的分子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等人的研究团队，对中国境内居住的人群进行了大规模基因取样调查和研究，研究的结果也得出同样的结论：现今汉人为主体的黄色人种的华夏祖先们，是距今 1.2 万 ~ 1.5 万年前后，即最后一个小冰河期的末期从东南亚进入东亚大陆的（进入东亚大陆的这一支黄种人是距今 5 万年前后从印度进入东南亚的，而印度这一支又是更早从西亚迁徙过去的）。现所见距今万年以内的所有文化遗址，都是这批从东南亚进入的黄种人留下的。他们也是今天中国人的远古祖先华夏民族的来源。^①

分子人类学关于中国人来源的观点与近百年权威的中国人本土起源说观点区别甚大，这个观点的依据也仅仅是分子生物学，而且还有很多比较粗略和不能确定的环节。本土起源论和外来迁入说哪一种观点更有道理，学术界对此尚有分歧。目前来看，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因为基于最前沿的科学研究成果基础上，似乎更有说服力。但不管哪种观点，它们都否定了拉克伯里关于中华祖先是公元前 2 300 年前后从西亚迁徙来的观点，都确认了至少距今万年以来我们在东亚大陆看到的那些重要的文化遗存都是居住在这块大陆上的现代中国人的祖先们创造的，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分歧的。因此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起源的描述正可以此为基础和起点。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界限

传统文化指的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积累的、递相传承的，并对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长远而深刻影响的器物、制度、规则、习俗、观念和心理等。在理解“传统文化”这一概念时，要注意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指的是某个社会共同体，某个社会群体、行业、职业或领域中相延既久的一些观念、标准、规范、行为方式等。

第二，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文化传统有较高程度的稳定性和继承性。

① 参看王传超、严实、李辉：《姓氏与 Y 染色体》（载《现代人类学通讯》，2010，4：e5）；王传超：《分子人类学所见东夷族群的起源与演化》（载科学网博客，链接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48453-871259.html>）；李辉：《走向远东的两个现代人种》[载台湾《国父纪念馆馆刊》2004（14）]；金力、李辉：《重建东亚人类的族谱》[载《科学人》2008 年 8 月（78）]等文。

第三，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内在的构成因素是在不断更新和淘汰的。

第四，一种复杂而丰富的文化传统都不是由单一内容构成的，都内含着多种异质性内容，它们之间的消长生灭往往是由其内在不同因素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导致的。

第五，任何文化传统都会面临异质性文化的压力，它可能分别以同化或顺应为主要模式应对。以同化为主应对，则一种文化传统会大体保持其整体的统一性和延续性；以顺应方式为主应对，则一种文化传统会出现大幅度偏移、改变甚至断裂。

第六，从整体上看，一种文化传统的巨大改变和断裂，往往与文化载体和产生基础的巨大改变相关。文化载体在这里指的是承载特定文化传统的人群。特定载体的消失或改变，会导致文化传统的改变。这里的基础，指的是特定文化产生所依赖的特定自然环境、经济生产方式、聚落方式，这些基础的大幅度改变，往往会导致文化的巨大改变甚至断裂。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和积累的物质、制度、规则、习俗、观念和心理等。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多源汇集、兼融八方的历史特点与发展格局，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兼容并包、博大精深而又不断更新的动态概念。在全球化日益推进的今天，我们学习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要在全球化坐标上正确认识与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充满文化自信地让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

本讲小结

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其定义有几百种。本讲在介绍中西方关于“文化”一词不同理解的基础上，总结出一个共识性的结论：文化是人类特定群体创造的、可以递相传承的、使人类特定群体以特定方式生活的全部成果之总和，它包括了器物、制度和符号三个基本层次，同时所有的文化成果都是为人类生活创造和积累的，也一定会体现在人类生活方式之中。在此基础上本讲分析了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功能。并介绍了“中国”概念的历史发展、中国人

的由来、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等问题上的有关知识。

【复习与练习】

| 复习

1. 文化的基本内涵。
2. 文化的基本特征。
3. 文化的基本功能。
4. 中国的概念与中国人种的来源。

| 思考与练习

1. 文化三层面构成中最重要的的是什么？
2. 分组讨论：人性是先天赋予的，还是后天养成的？它和文化有什么关系？
3. 分组讨论：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和巴比伦、埃及关系密切，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4. 该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中的华夏文化的主体性与多民族文化的关系？

| 课外阅读文献

1.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 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
3. 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4. 钱穆：《文化学大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5. [英] 阿兰·斯威伍德：《文化理论与现代性问题》，黄世权、桂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6. [美] 尤金·N. 科恩、爱德华·埃姆斯，李富强编译，《文化人类学基础》，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7. 曾仕强：《中华文化的特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第二讲 先秦分权时代 文化发展概观



在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文化是唯一历经几千年未曾中断而传承发展的文化。它是在怎样的基础之上生长、发展和绵延的？它有怎样的历史过程和特征？是怎样的外在和内在的条件和原因使之得以长期存在和发展？我们将分两讲概要地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特征进行描述。这两讲的区分标准是以秦为中分线的中国历史的两大时代，一是秦以前的酋邦-王国分权时代；二是秦以后的帝国集权时代。这两个时代的历史和文化当然有连续性，但也有明显区别，故有必要分别进行介绍。本讲介绍中国上古酋邦-王国分权时代的历史与文化发展概况。

上古酋邦-王权时代，大体可区分为酋邦时代、方国时代、王国时代三种有内在关联但也有区别的时代。酋邦时代，指的是春秋战国传说中的上古炎黄尧舜时代。如果传说中的这些时代存在，那还不是有国家形态的时代，当时的社会共同体只是多个大的部落组成的酋邦或部落联盟，这种酋邦只是一个松散的共同体，共同体内各部落都有极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至于夏代，如果这个朝代存在，那应是多个大酋邦组成的松散酋邦国家。在这个共同体中，夏人族团力量较为强大，故成为酋邦国家的中心。商代建立的国家是中央-方国类型的社会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商人族团处于中心地位，对周边方国拥有一定控制力，周边方国对商人族团表示臣服，但具有相当独立性和自主性。甲骨文多见周边方国不服从商王，商人出兵征讨的记载，可见处于中央的商人与周边方国还是一种相对松散的关系。周人建立的国家则是王权国家，这个国家内，周人族团不仅处于中心位置，而且对周边其他族团具有远比商王室强大的控制力，周边其他国家主要是由周王宗室或盟邦分封建立、得到周王室认可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的土地和所有诸侯，在名义上都是周天子领导和控制的。但各诸侯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外交上，都有相当大的独立自主空间。

所以，在上古时代，国家形态是一步步形成和具备的，由较小地域部落组成的松散酋邦到酋邦国家、到较大地域的中央-方国，再到更大地域的分封制王国，规模在一步步扩大，处于中央位置的族群对共同体内其他族群的控制力一步步增强。但即使是周代王国时期，中央王权对其他族群的控制力也不具有绝对性。各诸侯国都有较大独立性和自治权力。因此，无论是更远的酋邦和酋邦国家，或是商代的中央-方国国家，还是周代的王权国家，相对秦以后的集

权帝国，客观上都是一种分权式社会共同体，这种分权并非最高地位的统治者的意愿，而是有不得不这样的历史原因。

下面对上古分权时代中国历史文化概况作一概要性描述。

第一节 中国文化产生的基础

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都有特定的基础，这个基础可以有许多方面，但最基本的是地理环境、基本经济生产方式、基本聚落方式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直接和间接地决定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群体的物质文化、生活方式、各种制度和精神观念系统的性质和特征。因此，要理解中国文化何以如此，就必须从这三个方面对其基础进行考察。

一、半封闭的地理环境

对于人类古代各民族文化和历史的研究，历史学家和文化史学家都十分重视自然地理环境的决定性作用。19 世纪，西方历史学界盛行的环境决定论认为，不同民族和族群生活的自然环境，总体上限定了生活于其中的人类的生活方式、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甚至民族遭际和命运。越往古代，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和限定作用就越大。环境决定论也许过于绝对，所以 20 世纪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用“挑战-应战”的模式来解释环境对人类的重要作用。不管是“决定论”还是“挑战-应战论”，都肯定了环境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影响和作用，这种影响和作用越往古代越大。

中华民族生存的东亚大陆地理环境的基本特点就是半封闭性，高山、大海、荒漠阻隔着外界与中华民族所居住的东亚大陆的大规模交流。中国的西部地区，主要有青藏高原将中国与西南亚阻隔；西南方向则有云贵高原将中国与南亚阻隔；从南方到东方，则有浩瀚无垠的太平洋形成天然屏障。只有西北和北方面临着欧亚大草原，而且，这中间还有浩瀚的千里沙漠、人迹罕至的戈壁荒漠、帕米尔高原、阿尔泰山、外兴安岭等形成相对阻隔，使东亚大陆与中亚、西亚和东北亚大规模交流形成障碍。中国地理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周边有

高山、大海、沙漠、戈壁环抱，它像一个巨大的盆地，这个大盆地由平原和众多中小盆地低地构成，将外族文明与中国相对隔离，形成了独自一系的半封闭地域特点。

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古代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华夏先民，与东、南、西南等方向隔着高山大海的国家之间，都只有小规模相互交流，而无法发动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或扩张性战争。只有北面和西北面长期面临草原游牧民族的压力。这种压力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总体上具有积极意义。这种积极意义表现为，一方面，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民族在至少 5 000 年之前就进入农耕为主的文明时代，比游牧文明高级。在与北方和西北草原游牧民族大规模冲突和交往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不管谁阶段性战胜谁，最后的结果都是以华夏民族为核心融合草原游牧民族，从而形成滚雪球式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游牧民族的融入给华夏民族带来了血缘和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活力，而华夏民族的文明则提升了游牧民族的文化层次和品质。另一方面，任何文明，如果在没有外在压力的完全封闭的环境中生长和发展，这种文明必定比较脆弱，一旦突然遭遇强大异质文明压力时就会脆断。如果中国地理环境是一个纯粹类似于美洲大陆的封闭世界，也许中华文明早就被消灭了。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相当的抗击打能力和对抗精神，这与中华民族长期面临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的巨大压力有关。正是这种压力，使中华文明长期保持着一种内在的对抗能力和竞争意识。而且，这种压力在大多数时候其压强相对有限，一般都没有巨大到足以使中华文明脆断崩溃的地步。孟子说国无外患者国恒亡，是十分有洞见的说法。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人具有热爱和平的平和的民族性格，这当然不错，但中国人也有对抗、斗争的精神。保存敌人和外患，对一个民族的生存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历史上，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国家和文化一直得以保存延续的只有中国，其他几大文明古国都先后被异族消灭。这几个文明古国的覆亡原因复杂，其中之一是它们在地理环境上缺少中国这样半封闭性的地理屏障。几千年漫长历史中，中华民族和文化未被异族消灭，在冷兵器时代，很得益于中国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它四面的高山、大海、沙漠、戈壁，成了保护自己的天然屏障，将那些强大的国家和文明阻挡在外。

这种半封闭地理环境的屏障作用，到了 19 世纪以后就慢慢消失了。在中国东北、西北部草原戈壁之外，崛起了横跨欧亚的沙皇俄国及苏联政权，而东边和东南方向的大海，恰恰成了欧美日帝国强大海军舰队几无障碍驰骋的疆